

民国史谈

弹指興衰多少事

孙中山片断

蒋介石踪迹

民国创建

北洋人物

北伐前后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国共关系

抗日救亡

经济、文化与社会

外交风云

文人逸事

下册

杨天石主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民国史谈 弹指興衰多少事

孙中山片断

蒋介石踪迹

民国创建

北洋人物

北伐前后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国共关系

抗日救亡

经济、文化与社会

外交风云

文人逸事

下册

杨天石主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MULU

一 孙中山片断

1

- 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案的记载 刘蜀永 / 2
- 清政府乞求日本驱逐孙中山 杨天石 / 4
- 孙中山与上海中华银行 周兴梁 / 5
- 民国创立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何 铭 / 7
- 从孙中山等人的一通佚函看“二次革命”
失败的原因 陈正卿 / 9
- 孙中山论政党政治和革命党执政 朱宗震 / 11
- 民国四年孙中山的国庆祝词 肖 朴 / 15
- 孙黄重新合作的代价 朱宗震 / 17
-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 陈漱渝 / 19
- 孙中山创建广东空军的一段史实 陈正卿 / 22
- 蔡元培请孙中山下野的一段史事 张学继 / 24
- 冯玉祥请孙中山北上前后 丘权政 / 27
- 李烈钧 1924 年出访日本 周兴梁 / 30
- 孙中山对沙面工人罢工的支持 周兴梁 / 32
- 孙中山北上途中的几次重要谈话 周兴梁 / 34
- 闻一多与“南海之神” 闻黎明 侯菊坤 / 36

二 蒋介石踪迹

39

- 汪蒋合作及分离始末 张学继 / 40
-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 杨天石 / 42
- 北伐中蒋介石负伤身死的风传 杨天石 / 44
- 1927 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杨天石 / 46
- 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杨天石 / 48

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	杨天石 / 51
冯玉祥调停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张学继 / 53
唐生智“东征”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张学继 / 55
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张学继 / 57
蒋介石 1927 年的日本之行	张学继 / 60
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	杨天石 / 62
蒋介石北伐京津的密谋	习五一 / 64
蒋冯阎李四巨头祭告中山之陵	张学继 / 67
庐山谈话会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郭 雄 / 69
蒋介石的呆笨军事指挥	朱宗震 / 71
蒋介石对越级指挥的辩解	谈 斌 / 73
蒋介石为官僚资本辩护	朱宗震 / 76

三

民国创建

79

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杨天石 / 80
番花同盟分会与广州新军及“三·二九” 之役	康 乐 / 81
何天炯谈“三·二九”起义	杨天石 / 83
一九一一年广州人民率先悼念黄花岗烈士	周兴梁 / 85
民国初年的自由党	陈长河 / 87
黄兴与中华民族大同会	陈长河 / 90
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之争	肖 朴 / 92
民初广东军政府的禁烟禁赌斗争	周兴梁 / 94
民初广东革命家解放妇女的种种努力	周兴梁 / 97
广东军政府关心民众疾苦二三事	郑 榕 / 99
邓铿严禁贩卖人口	陈长河 / 101
松江佃户会与新式农民运动的萌芽	肖 朴 / 102
陈布雷与宋教仁	陈长河 / 104
陈布雷笔下的“二次革命”	陈长河 / 106
张振武与宋教仁之死	何 铭 / 108
“宋案”侦破的经过及意义	周兴梁 / 111
李烈钧迟疑失军机	何 铭 / 113
“二次革命”中宁沪军事协调问题	谈 斌 / 115
邓铿与一九一三年广东反袁独立	陈长河 / 118

辛亥革命后的客籍军队	朱宗震 / 119
评黄兴的“缓进论”	朱宗震 / 121
民初梁启超的“新权威主义”——对袁世凯 实施开明专制的期望	朱宗震 / 123
陈其美之死	朱宗震 / 126
辛亥·癸丑·丙辰三次革命战争的总结	朱宗震 / 128

四

北洋人物

131

陆徵祥演说失败与组阁危机	朱宗震 / 132
袁世凯政府指望的中日“互助”	杨天石 / 134
袁世凯伪造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杨天石 / 136
蔡乃煌禁烟卖烟	朱宗震 / 138
卢永祥与浙江联省自治	汪朝光 / 139
段祺瑞对日《秘密意见书》	杨天石 / 141
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倒戈反奉	丘权政 / 144
天津蔡园会议与孙传芳的“足疾”	习五一 / 147
孙传芳争废中比条约	习五一 / 149
孙传芳为何向奉系乞降	习五一 / 151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电报战”	习五一 / 153
张学良率军三渡黄河	习五一 / 154
张学良亲挽敌将	习五一 / 156
张作霖的“四民主义”	习五一 / 157
张作霖自称“中山老友”	习五一 / 159
张宗昌的四维主义	习五一 / 161
张作霖的对日“蘑菇”术	习五一 / 162
皇姑屯谋杀张作霖案的幕后	习五一 / 165
军警索饷与杜锡珪内阁的垮台	习五一 / 167
洪述祖临终遗言	朱宗震 / 168
潘复的“节流”新政	习五一 / 169

五

北伐前后

171

陈炯明与援闽粤军	郑 屹 / 172
广州“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	兴 梁 / 175
滇军第四师的哗变与投敌	周兴梁 / 177
熊克武的被拘与释放	周兴梁 / 178

“三·一八”惨案与国民军	丘权政 / 181
北伐时期的迁都之争与宋子文	杨天石 / 183
1927 年南京事件之谜	牛大勇 / 186
王天培死因之谜	张学继 / 188
张学良和平易手京都与鲍毓麟旅缴械风波	习五一 / 190
天津易帜的曲折波澜	习五一 / 193

六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195

宁汉合流的“特委会”成立内幕	张学继 / 196
吴稚晖与汪精卫的一场笔战	张学继 / 198
南京“一一·二二”惨案风波	张学继 / 200
1928 年的建都之争	张学继 / 202
邓演达被捕实情	陈漱渝 / 205
史良竭力营救邓中夏	周天度 / 207
西安事变和“七君子”案的一则史料	周天度 / 209

七 国共关系 213

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中的卓越贡献	康 乐 / 214
也谈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问题	周兴梁 / 218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四项提案	杨天石 / 220
广州的“二·七”大罢工周年纪念	周兴梁 / 223
“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国民党员	王善中 / 225
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	杨天石 / 226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史 知 / 229
“分共”会议上的于右任与彭泽民	杨天石 / 232
冯玉祥为何一度“清共”	丘权政 / 234
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	杨天石 / 236
陈济棠“外打内通”，给中央红军借路	周兴梁 / 238
董健吾、张子华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汪朝光 / 241
1936 年的国共上海——南京谈判	汪朝光 / 243
蒋百里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继 / 244
国共合作的平型关之战	朱宗震 / 246
黄河归故道之争	汪朝光 / 249

1946年初四平街攻防战的政治意义	朱宗震 / 251
淮海之战黄维陷围时的形势和指挥问题	朱宗震 / 254
一次鲜为人知的营救张学良行动	陈正卿 / 256

八

抗日救亡

259

宋教仁笔伐日本军国主义	习五一 / 260
1927年东北反日爱国民众运动	习五一 / 262
“九·一八”事变后的王造时	周天度 / 264
“一·二八”抗战中的宋庆龄	唐宝林 / 267
丁文江关于停止剿共准备抗日的主张	朱宗震 / 269
1932年的国难会议	张学继 / 271
邹韬奋和《大众生活》	周天度 / 275
章乃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周天度 / 278
铁骨铮铮的李公朴	周天度 / 280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始末	郭 雄 / 282
“七君子”的被捕与释放	周天度 / 284
抗战以前的中国空军	汪朝光 / 287
“七七”事变为什么发生在卢沟桥	郭 雄 / 289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略地位	朱宗震 / 291
1937年的国防参议会	周天度 / 293
日本为何对华采取战而不宣方针	郭 雄 / 296
近卫文麿的“最后通牒”——“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郭 雄 / 298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与《抗战建国纲领》	郭 雄 / 300
关于台儿庄之战的评价	朱宗震 / 302
抗战中国国民党军的侧击战术	谈 斌 / 304
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侯菊坤 闻黎明 / 307
冯玉祥与三户图书印刷社	丘权政 / 310
日本的对华侵略总机关——兴亚院	郭 雄 / 312
抗战时期的中央设计局	汪朝光 / 314
抗战期间军队的经商风	朱宗震 / 316
中国抗战与外国军火	汪朝光 / 317
“美械化”部队的由来	汪朝光 / 319
青年军始末	汪朝光 / 321

接收台湾前后	汪朝光 / 323
抗战胜利后的资源委员会	李 轶 / 325

九 经济、文化与社会

327

广州慈善机关与七十二烈士的营葬	兴 梁 / 328
李烈钧治赣的金融政策	肖 朴 / 329
盛宣怀复产的讨价还价	何 铭 / 331
程德全靠夫人治家殖产	肖 朴 / 334
民国初年的印花税	肖 朴 / 336
民国三年内国公债的发行	朱宗震 / 339
1915 年的储金救国运动	尹俊春 / 341
上海中国银行对中文停兑令的抵制	肖 朴 / 343
袁政府金融混乱 洋教士旅途受窘	肖 朴 / 345
廖仲恺的富国裕民经济建设思想	周兴梁 / 347
何香凝倡导中国妇女纪念“三八”节	康 乐 / 348
“五四”后所谓北大南迁问题	耿云志 / 350
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引起的风波	耿云志 / 352
“中电”与“中制”	李 轶 / 354
《扫荡报》的兴衰起落	汪朝光 / 357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对策	朱宗震 / 358
马寅初有关官僚资本的论述	朱宗震 / 361
民国史上的征兵制	李 轶 / 363

十 外交风云

365

民初广东军政府的外交活动	史 知 / 366
顾维钧争国权舌战牧野伸显	牛大勇 / 368
美国在关余问题上的态度	陶文钊 / 370
裴克斯使华与中苏交涉	汪朝光 / 372
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问题	汪朝光 / 375
1919—1929 年间列强对华军火禁运	汪朝光 / 379
1924 年广州学界收回教育权的反帝爱国斗争	周兴梁 / 382
为中国革命捐躯的苏联英烈——巴甫洛夫将军	周兴梁 / 384
英国是怎样策划武力压制省港大罢工的	牛大勇 / 386

英舰强泊西堤与省港大罢工之收束	牛大勇 / 388
陈友仁与蓝普森的汉口会谈	牛大勇 / 390
顾维钧与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	习五一 / 392
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	习五一 / 395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	习五一 / 397
英国弃守汉浔租界的原因	牛大勇 / 399
民众自发冲占汉浔英租界始末	牛大勇 / 401
顾维钧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	习五一 / 404
日本东方会议与对奉强硬交涉	习五一 / 406
汪精卫叛逃河内遇刺	郭 雄 / 408
1946 年底——国民党情报对香港前景的预测	朱宗震 / 411
司徒雷登谋求与中共对话	牛大勇 / 413
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	牛大勇 / 415
当年美国分离台湾的密谋	汪朝光 / 417

十一

文人逸事

419

宋耀如与商务印书馆	陈漱渝 / 420
邹容自贬《革命军》	杨天石 / 421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杨天石 / 423
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	杨天石 / 425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杨天石 / 427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杨天石 / 429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杨天石 / 432
章太炎与民元建都之争	张学继 / 435
陈范与《红楼梦》研究	杨天石 / 437
蔡元培以政见为重坚辞教育总长职	肖 朴 / 438
劳乃宣与《共和正解》	何 铭 / 441
戴季陶的文字狱	朱宗震 / 443
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深厚友谊	周天度 / 445
五四运动中的罗家伦	周天度 / 448
罗家伦纵论世界新潮	习五一 / 450
罗家伦与新文学运动	习五一 / 452
罗家伦致张继先生的第一封信	习五一 / 453
《威权》与陈独秀被捕案——胡适脞谈之一	陈漱渝 / 455

两位先驱者之间——胡适胜谈之二	陈漱渝 / 458
李大钊的才、识、德——“五四”风云人物谱之一	陈漱渝 / 460
“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刘半农——“五四”风云人物谱之二	陈漱渝 / 463
勇于立言的钱玄同——“五四”风云人物谱之三	陈漱渝 / 466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陈漱渝 / 469
“愚公移山”——一个“五四”青年的人生观	何 铭 / 471
杨荫榆是怎样的人	陈漱渝 / 473
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杨天石 / 475
《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鲁迅与章衣萍	陈漱渝 / 478
《现代评论》停刊后的陈西滢	陈漱渝 / 483
傅斯年其人其事	陈漱渝 / 485
傅斯年与国民党	肖 朴 / 489
徐志摩空难事件	陈漱渝 / 491
徐志摩死因补叙	陈漱渝 / 494
马君武与张学良的一桩公案	张学继 / 497
张闻天·鲁迅·胡秋原——左联时期围绕“文艺自由”问题的一场论辩	陈漱渝 / 499
胡适与《独立评论》周刊	肖 朴 / 502
巧妙的讽谏——读蔡元培佚稿《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	陈漱渝 / 504
沙千里和蚁社	周天度 / 506
沈钧儒与三十年代冤狱赔偿运动	周天度 / 508
斯诺是如何进入红色区域的？	陈漱渝 / 511
陈西滢与现代评论派	陈漱渝 / 513
漫议林语堂	陈漱渝 / 515
章士钊面面观	陈漱渝 / 517
我也来谈梁实秋	陈漱渝 / 520
胡适的情感世界	陈漱渝 / 523
八十年前关于爱情的大讨论	陈漱渝 / 526
宋庆龄和鲁迅为什么谴责“福建事变”	陈漱渝 / 532
陈仪的疏通与郭沫若回国	陈正卿 / 534
冯玉祥、徐树铮公案的最后一场风波	陈正卿 / 536

八 抗日救亡

宋教仁笔伐日本军国主义

习五一

自1911年2月，至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时，宋教仁一直担任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他一面秘密参与策动武装起义，一面以其主要精力，勤奋笔耕，不断发表长论短评，以抨击日本侵华势力为主要锋芒所向，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时政评论家。

宋教仁的首篇宏论题为《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他开宗明义，赫然写道：

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已。



宋教仁像

这种以犀利的锋芒，笔伐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阴谋的格调，成为其时政评论的首要旋律。在宋教仁执笔《民立报》论坛期间，先后发表长篇评论约三十余篇。其中抨击清廷政局，阐发思想文化，各约占百分之十。其余篇目均为揭露谴责列强侵华阴谋，分析国际政治趋势。在这一类时论中，主要笔锋指向日本的，约占百分之七十。

宋教仁将旅日期间对日本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将其悲愤激越的民族忧患意识，尽情倾注于笔端，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多方位剖析了日本“吞并东亚”的侵略方针。

宋教仁认为，日本民族“尚武喜功”，“终始崛强东方”。明治维新以后，“举国上下，卧薪尝胆，处心积虑，挟全力，用全智”，“以亟图国外发展”。他例举大量实证，详尽揭露了日本“以朝鲜为发轫地”，“包举满洲”，进而称霸东亚的侵略趋势。他强调指出，这种侵略趋势的



必然性在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向海外扩张的动力，他写道：

前此国民经济需供不多，可以自给者，今则工商之业为国命脉，非求供给之来源与需要之顾客不可焉。而环顾四方，惟脆弱之朝鲜与老大之支那尚可问鼎之轻重，于是殿手三韩，伸足辽左，长驱以入禹域之政策，遂为彼国唯一之国是，而东亚天地无宁日焉。是日本吞并东亚政策之所由来也。

这种为重大历史趋向，寻求经济根源的思考，颇具客观冷静的唯物色彩。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极富本土民族色彩，它由少数藩阀与武士策动明治维新起端，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变革，因而与封建传统的承袭关系较为密切。对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宋教仁具有相当清晰的透视力。他指出：

惟吾人观日本之政治，号称立宪几三十年，而犹不能脱少数人垄断专制之习，左右国务者，总之不离乎藩阀武人者近是。

正是这种藩阀武人政治深厚的影响力，终于导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战争道路，对此，宋教仁在当时就指出：藩阀武人“握政府之重柄”，“继续行其武断的政策，所谓大陆帝国主义者，必更益实现，而与之有密切关系之中国，自是将益无宁日。”

日本向东亚大陆侵略扩张，以武力为其实力后盾。然而，战争毕竟是各种矛盾急剧激化的冲突形态，在其相对平衡的缓冲期间，经济则具有更持久的渗透力。1911年春，日本政府假借横滨正金银行之手，向清朝政府贷款一千万元。消息传出，引起远东国际论坛的震动，宋教仁接连发表评论，大声警告国人：这一极危险事件，“其影响较之俄窥蒙古、伊犁，英占登埂、片马，而犹重大十倍”，其目的在于，妄图使日本的“经济力单独盘据吾国政府之上”。考察当时日本的经济力量，并无担当巨额债权国的实力。全国资本积累，不及欧美各列强的十分之一。贸易入超，金融紧迫，财力虚弱，其政府债台高筑。它在伦敦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公债，价格低落，往往不及中国政府的债券。日本政府处心积虑，谋求向中国贷款，企图借此寻求干预中国财政的口实，扩大其在华的侵略势力。宋教仁洞察日本的侵华阴谋，尖锐指出：

二十年来，日本之跋扈飞扬，亦已极矣！其注重者，大抵在武力的侵略政策，以故有甲午、甲辰两战役之胜利。今乃鉴于国际形势变化推移之局，而复参用经济的侵略政策，驱其资

本以角逐于东亚大陆，以制人之死命。经济力与武力同时并进。

日本侵华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必然加剧列强在华的激烈角逐。为在远东角逐场上获得优势，日本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它频频向俄国致意，力图与其释怨握手，协调双方武力瓜分满蒙的步伐。它不断向英国暗送秋波，企图续结《英日同盟条约》，以抗衡日益在远东崛起的美国。美国首倡“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方针，已成为列强外交的重镇，其凭借腾飞的经济实力，必将问鼎远东盟主的宝座。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日趋白热化，终将导致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对此，宋教仁预言道：

吾意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派与武力的侵略派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

后来历史的进程，为这一预言作出详尽的注释。二十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东三省。再越十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与美国不宣而战，燃起了太平洋战争火焰。远东战争的硝烟，证实了宋教仁多年前的警言。

1927 年东北反日爱国民众运动

习五一

1927 年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扩大侵略特权的态势不断加剧，在东北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东三省反日爱国的民众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这次波及东北各地的反日运动，起源于抗拒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斗争。日本企图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以扩张其侵略势力，蓄谋由来已久。自 1923 年起，日本政府不断向奉方交涉，屡遭拒绝。1927 年春，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日方骤然加速了强行设领的步伐，激起了临

江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7月下旬，日方公然通告县公署，将“采取武装”，单方面强行设立分馆。临江人民闻讯后，立即聚众上万，要求政府誓死抵抗。农工学兵，愿为先驱，爱国绅商，捐资纾难。大家决心“拼十万头颅，一腔热血，与彼野蛮日人周旋于鸭绿江边”。在民众激昂的呼声中，县知事袁葆真命令所属警甲，严阵以待。

临江县官民拒日设领的正义斗争，首先得到东三省政治中心——奉天朝野各界的有力支持。省政府认为，日方“竟拟率兵入临，强设领馆”，“殊属恃强无理”。它决定一面饬令县知事“妥为阻止”，一面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请其“迅向日使严重交涉。”同时，省议会以部分同仁的名义，于8月2日发起组织东三省外交后援会。继之，各界民众团体纷纷组建外交后援会，其中，以奉天总商会为中坚。10日，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后援会正式成立。该会近期首要任务为声援临江人民拒日设领的斗争。进而，它要求撤废二十一条，撤废领事裁判权；反对东方会议议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满蒙政策。奉天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公开化。

此后，日方展开强硬外交攻势，索要侵略特权的消息，不断传出。这犹如火上浇油。奉天省燃起的反日烈火，迅速向东北各地蔓延。

9月4日，奉天各界民众二万余人集会，宣布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会后，民众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每人手执白旗，上书“打倒田中内阁侵略政策”、“拒绝日本临江设领”、“取消二十一条”等标语。沿途传单空中飞舞，成千上万民众涌入游行行列，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洪流。

同日，吉林省各界民众团体联名通电全国，严厉谴责田中内阁推行的侵华强硬方针，宣布成立吉林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明将以“数千万之铁血头颅”，“为最后拼抵之利器”。通电全文字字句句激扬着震撼人心的爱国热忱。7日，吉林省议会召集工、农、商、学各界民众团体聚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强行设领等侵华暴行，反对日方逼索特权的“满蒙交涉”，表示为此不惜一战。

9月20日，在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手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抗侵略满蒙”的旗帜，高呼口号，沿途演说，散发传单。

反日示威游行，不仅席卷了东三省省城而且深入到中小城镇。9月13日，洮南县民众“聚四、五千人，遍街游行，宣传排日”。

以奉天省为龙头的东北反日民众运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运动中出现打倒日本内阁的旗帜，这在近代反日民众运动中是第一次。

东北地区波澜壮阔的反日运动，震惊了日本政府。9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奉田中首相之命，向张作霖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彻底取缔东三省的反日运动。面对日益激进的民众运动，张作霖也担心它将危及现存的统治秩序。于是，他立即致电奉天省长莫德惠，令其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9月9日，杨宇霆奉张作霖之命，答访日本公使芳泽。首先，杨向日方疏解“奉天排日事件”。他向芳泽说明，张作霖已迭电严加制止，今后，东北不会再发生此类事端。其次，杨与日方磋商“满蒙交涉”议案。他通告对方，北京外交当局拟将日方备忘录中的各项议案，择其易于解决者归地方协商，其关系重大者实行搁置。这样，奉方虽然以强力制止了令日方震惊的民众运动，而实际上，同时借反日浪潮的声威，单方面中断了日方急切推行的“满蒙交涉”。

对此，日本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反响。9月13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研究东三省反日运动的局势及“满蒙交涉”的对策。会后，田中首相发表声明，表示在反日运动平息以前，“满蒙交涉”暂行中止，但日本对华方针决不因此而变更。

张作霖见棘手的“满蒙交涉”已经中止，便不再发表“一体抗议”之类的豪言壮语了，取而代之的是，下达了“制止排日运动”的训令。训令严厉告诫道，如再发生民众反日运动，“着即督饬军警严行制止，如文武官吏奉行不力，滋生意外枝节，惟各该长官是问。”奉天省长莫德惠立即遵令“严行禁止”“商民游行”，“并传知各报馆，将激烈标语限止登载”。其后，杨宇霆亲自回奉，督察政情。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发起反日风潮的中坚——奉天省总商会日趋软化。东三省的反日民众运动，随之渐次低落。

“九·一八”事变后的王造时

周天度

“九·一八”事变后，一大群爱国知识分子受时局刺激，开始反思，从不关心现实政治的思想状态中省悟过来，挺身而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错误的内外政策，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王造时是代表人物

之一。

王造时二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兼政治系主任，并在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课。“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认为救亡是第一要义，因此改变了原定的至少五年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以便著书立说的计划，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0月10日，王造时写毕《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随即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书中针对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指出：“时至今日，国家以人民的血汗，养兵数百万，只能用于同室操戈，而不能用于对外作战；只能用于压迫人民，而不能用于反抗日本，天下痛心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他大声疾呼：清除党见纷争，采取根本有效办法，对外准备殊死战，与日本拼命到底。他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今日中国民气消沉已极，回顾五四、五卅，相去不知几千万倍，推其原因，一党专政不能不负责任。在一党专政之下，问其名曰民国，究其实为党国。所谓党国，即是党的国家，而非人民的国家。人民对于国事既无权过问，当然对于国家观念也就日形淡薄。大家以为国家为党所有，一切国事有党员负责，我们小民尽可得过且过。就是有少数急公好义的爱国志士，也因言论行动不能自由，稍有动作，不是被认为‘反动’，便被指为‘反革命’，干涉拘捕，无微不至。在这种空气之下，当然只有官办的民众运动，没有自办的民众运动。党部监视，名为‘指导’，政府钳制，名为‘镇静’。国人惧于威压，人心变成麻木，国事如此，民气如此，尚可问乎？”他还尖锐地指出：“若这次日本空前的侵略，国民党大权在手，没有坚决的表示，甚至于反而在压迫救国运动，那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民党必被人民打倒无疑。”10月26日，王造时又和沈钧儒等在一封公开信中陈述对时局的意见，提出：一、对日交涉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等，不能丝毫退让；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打破一党的小天地；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必须尊重人民权利，结束党治以来人民权利剥夺殆尽、法律上所应享有的一切自由绝无保障的状况。

为了抗日救国，王造时还走出课堂，与章益、谢循初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接着又与其他救国团体联合组成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王造时积极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并和熊希龄、左舜生代表